

熊承滌 著

中国古代 学校教材 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GUDAI XUOXIAO JIAOCAI YANJIU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

熊承涤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熊承涤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ISBN 7-107-11290-2

I. 中… II. 熊… III. 教材-中国-古代-研究 IV. 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544 号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

熊承涤 著

责任编辑:张廷凯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90,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90

ISBN 7-107-11290-2
G·4441 定价 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卷 头 语

关于中国古代教材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办好教育的实际工作中,除了国家规定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外,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教材。教师是学生的直接指导者,他们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教材是授给学生的精神食粮和知识宝库。因此,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过程中,作为教学内容的教材,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和教育家们所重视。

可是,长期以来,教育史科研工作者对教材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少。当前,教育史科研工作是教育科研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古代教材的科研工作又是教育史科研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例如,对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综合研究,对古代教育思想和学校制度的研究,对科举制度和书院的研究,都已经被人们注意;科研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还很少人注意对古代教材进行专门研究。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拓荒性的探索工作。

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很有限,分析能力又不高,在资料去取和理论分析方面,一定有疏漏乖误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给予指正。是为感谢!

熊承涤

一九九二年七月

目 录

卷头语·····	1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简述·····	1
中国古代儿童教材简述·····	7
中国古代专科教材简述·····	16
商代和西周学校的教学内容·····	24
孔子与作为教材的《五经》·····	32
先秦诸子论教学内容·····	53
秦代学校教材·····	64
汉代学校教材与经学·····	70
董仲舒、郑玄与教学内容·····	89
三国时期学校教材·····	98
晋代学校教材与玄学·····	110
南北朝学校教材的特点·····	122
隋代学校教材·····	136
唐代学校教材与唐代学术文学·····	143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165
五代学校教材·····	173
宋代学校教材与学术思想·····	181
宋代的蒙学教材·····	197
王安石的变法与教材改革·····	207
朱熹的理学思想与教材·····	218
辽、金两代学校教材 ·····	234
元代学校教材·····	246
明代学校的经学教材·····	258
明代的蒙学教材·····	276
王守仁论教学内容·····	285
明代几位学者论教学内容·····	295
清代前期学校教材与学术变迁·····	310
清代前期的蒙学教材·····	325
清初几位学者论教学内容·····	333
略论清代书院教学内容的演变·····	356
阮元与《十三经注疏》·····	370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简述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和教育很早就比较发达的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必须对古代的学校教材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工作。鲁迅在《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希望“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史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① 鲁迅的这种希望的确有他的深意存在。

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校教材，要研究它的发展情况，探索它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化等的密切联系。因为学校教材的发展与变革，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上述这些方面的影响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决定了学校教材的保守性；封建经济的落后性与科学技术的被轻视，影响了学校教材的发展与创新。但是，古代的学校教材，在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剖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把学校教材的研究放在社会政治的广阔背景与历史文化中去考查，才会理解得更深刻些。

通过对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研究，可以扩大和加深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学校教材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传授，或者是思想的形成、品德

^① 《鲁迅全集·准风月谈》。

的培养，都要通过教材，或者部分地通过教材才能实现。所以研究古代教育史，必须研究古代的教材，才能扩大和加深这种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古代的学校教材同古代文化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对学校教材的研究越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就会越深刻。

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校教材，需要探讨一些带规律性的因素。客观事物总有它的规律性，规律是在不断探索之中发现的。如果我们否定这种规律性，否定前人探索规律的意义，一切要从头摸索起，在工作中就会走很多弯路，付出很大的代价，就会推迟社会前进的步伐。如果我们利用前人的经验，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那么，认识就会一步一步地深刻，取得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大。古人在制定和编写教材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反映了带规律性的因素，也是我们继续探索教材的规律的凭借。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反过来又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样我们对学校教材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接近于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就会使我们今后制定和编写教材的工作做得日臻完善。

研究中国古代的教材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古代的教材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产生和流传的，必然浸透封建的意识，打上封建的烙印。我们要认真地分析其中的糟粕和可以批判继承的东西。有些情况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或者比较正确的，我们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它们可能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是完全错误的；有的甚至在当时就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予以批判和摒弃。

关于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研究，有哪些重点呢？下面简要地谈谈：

《五经》、《四书》是封建教育的主要教材，孔子是这些教材的奠基者。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开展教育

活动，开办私学，打破了“官府之学”的垄断地位；二是编订教材，搜集整理古代文献，编订《六经》，不但保存了古代文化，而且作为教材流传下来，影响很大。《六经》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政治、哲学、伦理、典章制度、文学、历史、艺术、音乐等方面。至于《四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学派的主要思想，作为教材，集中地传播了儒家思想。因此，研究古代教材，需要研究作为封建教材的《五经》、《四书》的演变和作用，研究孔子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汉代的学校教材与经学。汉武帝为了巩固封建政治的统一，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经学成了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热门，所谓“经学既明，取青紫如拾芥”，“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无论官学、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班固说是“利禄之势使然”，真是一语破的。在汉代经学讲授方面，今古文两派斗争很激烈。今文学派一直占优势。东汉末年在经学教材方面作了两件事：一是蔡邕校订了“熹平石经”，统一了教材文字；二是郑玄给经书作了比较权威性的注释。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经学作为课程，经书作为教材，在汉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学校教材与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仍，民生凋弊，统治阶级用“虚无”的老庄思想来麻痹人民，也来麻醉他们自己。何晏有《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有《周易注》和《老子注》，除直接用《老》、《庄》作为教材外，还利用儒家经籍的外壳，灌输道家的思想，构成风靡一时的玄学。刘宋更立玄、儒、文、史四学，梁朝继承这一制度，在分科教学中突出了玄学的地位。北魏却重视儒家教学传统，以加速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

唐代的学校教材与文学。唐初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作为国家统一教材。同时李善注释《文选》，从学者甚众，“选学”盛

行；韩愈兴起古文运动；唐代以进士科独盛，进士科主要考诗文；诗歌创作旺盛：这些与教材都有密切联系并在学校教材中反映出来。

宋元明的学校教材与理学。宋代建立理学，除《论语》作为主要教材外，提高了《孟子》一书的地位，并从《大学》、《中庸》中探索微言大义，《四书》的地位几乎超过了《五经》。朱熹作《四书集注》，以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四书》。元代规定考试从《集注》出题，程朱之学表现为官方思想。明成祖时编《性理大全》成为经典性的书。直至清代，封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用理学说教来加强专制统治，提高皇权。这种情况在教材中也体现出来。

宋代两位教材改革家——胡瑗和王安石。胡瑗是教育实践家。他在湖州任教，提倡分斋教学，立经义、治事二斋：在经义斋讲《六经》，在治事斋设治兵、治民、水利、算数等课程。他主持太学，把那些好经术、兵事、文艺以及讲节义的学生，“以类群居讲习”。进行分科教学，主张“治事通今”，这在课程教材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革。王安石为了实行新法，积极培养人才，所谓“熙宁兴学”。除了学校实行“三舍法”以外，在教材方面，他反对“声病对偶”，反对“章句传注”；亲自动手，编写了《三经新义》作为政府颁行的教材，主要是给《诗》、《书》、《周官》作出新解释，为实行新法找理论根据。还编写了《字学》。由于新法失败，这些教材使用的时间不长，但可以从此悟出一点：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必然伴随着教育改革和教材改革。

清代书院教学内容的改革。清初启蒙学者讲经世致用之学，在课程教材方面有很多新的主张，如黄宗羲主张“治史”，顾炎武主张“实用”，主张作社会调查，这些都是有革新精神的。由于统治者要利用理学来控制思想，教学内容还是以理学为主。书院教学

也是这样。但是有些学者另树一帜。如颜元在南漳书院设文学、武备、经史、艺能等六科。乾嘉以后，一些汉学家多以朴学教学，如惠栋主讲紫阳书院，讲考证学；阮元设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以经史为主，兼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科。此外，沈归愚主讲紫阳书院，提倡词章之学；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提倡桐城派古文。这样，书院的教学内容就逐渐扩大了。

古代儿童教材。我国古代的儿童教材特别注意识字和写字的教学。周时的《史籀篇》，秦汉的《仓颉篇》，汉魏以后的《急就章》，直到后来的《千字文》、《百家姓》、《杂字》等，都是识字课本。《仓颉篇》是秦汉时期主要的儿童识字教材，《急就章》是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这两本教材在唐代以前影响很大。后来编写字书都从此借鉴。《急就章》在书法方面也有很大影响，所谓“章草”。流行最广的儿童教材，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在教学方面影响是很大的。

古代有些教育家十分重视诗歌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作过一些理论上的阐述，并重视这方面的教材。如《千家诗》、《神童诗》、《训蒙诗》等，都属于这类教材。还编了不少儿歌，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

历史教材和历史故事书，在古代儿童教材中占有一定位置，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龙文鞭影》、《史学提要》等。这些教材一方面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和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也传授给儿童以历史知识，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

中国古代教育很注意儿童伦理道德的培养。《周易》上就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要通过教材来培养儿童的品德。这类教材如《童蒙训》、《少仪外传》、《小学诗礼》、《小儿语》、《性理字训》等。朱熹的《小学》影响尤大，一直流传到日本、朝鲜

等国。《论语》和《孝经》，从汉代起，一直作为学校的主要教材，也是为了进行封建伦理教育，宣传儒家思想。

古代有一种讲“名物”的教材，是类似讲自然常识的。如方逢蒙的《名物蒙求》，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当然，这些教材的科学性不高，种类也不多。古代教材缺少这一方面，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

古代编写上述各方面的儿童教材，有的经验多些，有的经验少些。有时代条件的局限，也有重视程度的不同，情况不一，但都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就。我们应当很好地研究这些教材，总结前人的经验，了解儿童教材的发展道路，并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古代女子教材。中国古代的女子教材可以追溯到《内则》，汉代班昭的《女诫》，直到传播最广的《女儿经》等。这些教材在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封建统治者不重视专科教育，但是也办过一些专科学校，如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画学等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在专科教育的教材教法方面，比较注重古典的基础理论的学习，注重教材的具体化、形象化，注重考试。这方面的史料虽然有限，也应当挖掘、搜集和整理。

古代教材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系。汉代以经术为诱饵，笼络知识分子。隋唐以后，封建统治者用科举考试来网罗人才，统制思想，教学内容就随着这根指挥棒转。后来八股盛行，《四书集注》垄断了意识形态领域。可见教学内容的改变跟科举考试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古代儿童教材简述

—

我国最早的儿童教材特别注意识字和写字的教学。识字和写字是对儿童的一种基本训练。儿童掌握了文字这个工具，就可以逐步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开拓认识领域，并且可以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接受道德、伦理、政治等各方面的所谓“化民成俗”、“成德达材”的教育。因此我国最早的儿童教材，主要是字书一类的读物。

据《周礼》说：“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所谓“六书”，系指事（如上、下）、象形（如日、月）、形声（如江、河）、会意（如武、信）、转注（如考、老）、假借（如令、长）。周时以《史籀篇》教儿童。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汉时以“三仓”教儿童。所谓“三仓”，即李斯作的《仓颉篇》，赵高作的《爰历篇》，胡毋敬作的《博学篇》，都是取史籀大篆加以省改，叫做小篆。汉兴，闾里书师把这三篇综合起来，统名《仓颉篇》，共五十五章，每章六十个字。古书中引《仓颉篇》的文句，有“幼子承诏”、“考妣延年”、“汉兼天下，海内并厠，翦黠韩复，畔讨残灭”（这是汉人顺续《仓颉》的文句）。

汉代儿童学习的场所叫“书馆”，教师叫“书师”。例如，王充“八岁出于书馆”，邴原家邻有“书舍”，都是指儿童学习识字和写字的地方。王充六岁，他的父亲就教他识字写字；他在书馆时，小同学一百多人，有的就以识字写字成绩差遭到体罚，王充

却由于识字写字成绩优异，八岁就离开书馆，去接受高一级的教育。

汉代的制度是学童十七岁以上，参加考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再参加八体书（八体书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的考试，成绩优等的可以为尚书史。可见识字写字是当时充当小官吏的重要条件之一。

汉魏以后一个时期，主要用《急就篇》作为儿童教材。先是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都是从《仓颉篇》中取来的字，但是没有重复出现的。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这也是一种字书。今本三十四章，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以教学童识字。崔寔《四民月令》说：正月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所谓“书篇章”，系指六甲、九九、《急就》、《三仓》。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

《急就篇》有三个字一句的，四个字一句的，七个字一句的，多数为七字句。章太炎在《论篇章》中说：“《急就》之文，泛施日用。尤便于闾里书师，盖取《仓颉》正字，书以草书，于当世之用最切，而后来书家亦爱书之，所以独传。”《急就篇》所选用的字，反映了秦汉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这本书成为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据史书载，晋夏侯德曾读《急就》；北魏太宗命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三卷；北魏崔浩一生书写《急就》以百数计；刘兰始入小学，学写《急就》；李绘六岁还没有入学就学写《急就》；李铉九岁入学，一个多月就学会写《急就》了。可见《急就篇》作为儿童教材的时间是很长的。到唐代以后才逐渐衰微。

唐时的儿童识字教材主要是《千字文》。据《尚书故实》：梁武帝从钟繇、王羲之书中拓取一千个字，命周兴嗣编为韵语。《千

字文》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隋代即开始流行。王定保《唐摭言》载顾蒙因淮浙荒乱，逃难到广州，旅居生活困难，只好抄写《千字文》教人以维持生活。可见当时《千字文》是流传得相当广的。以后有多种续编和改编本，如宋胡寅《叙古千文》、侍其玮《续千文》、葛正刚《重续千文》、元许衡《稽古千文》、明周履靖《广易千文》、李登《正字千文》，直到清朝，有何桂珍的《训蒙千字文》、龚聪的《续千字文》等。

除《千字文》外，唐时的儿童教材还有《蒙求》和《太公家教》，有一种杂字书叫《开蒙要训》。《蒙求》系唐李翰编著。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后志》中说，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盖以教童蒙云。”《太公家教》“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其书极浅陋鄙俚”^①。书中有这样的文句：“太公未遇，钓于渭水；相如未遂，卖卜于市；□天居山，鲁连海水；孔鸣盘桓，候时而起。”这本书在东北地区作为儿童读本历时五百年之久。可是在中原一带，自从采用《百家姓》、《三字经》、《杂字》一类书作为儿童教材后，这本书就散失了。

在五代时有一种儿童教材，叫《兔园册府》。王国维说这本书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②。它是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编的，为问答体，用梁王“兔园”取名。到宋代，藏书家就很少有这本书了。

宋时盛行的儿童教材有《百家姓》、《杂字》等。《百家姓》系北宋时编，作者佚名。“赵”是当时皇帝的姓氏，所以列在篇首。明代有《皇明千家姓》，改以“朱”姓居首。清康熙时有《御制百家姓》，以“孔”姓为首。但是广泛流行的还是第一种书。

① 王玉清：《玉照新志》。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

《百家姓》集姓氏编为四言韵语，共有四百四十四姓，其中包括六十个复姓。该书提供姓氏，虽然没有什么文理，但是便于诵读，简短易记。特别在农村广为流传。它在宋时被称为“村书”。陆游在他的《冬日郊居》诗注中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杂字》书继承了《急就篇》的传统，记载着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文字。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本子，作者和编写年代都很难确定，并且经常有所修订。这种书的实用价值是比较大的。

《三字经》的著者相传为宋王应麟（一说为宋末区适子），明清学者陆续补充，清王相和贺兴思的两种注本是流传较广的。还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本，如《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三字经》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教育、伦理、历史、古籍和社会常识等的说教和知识，所以曾被人夸张地称为“小型百科全书”。章太炎在《重订三字经序》中说：该书“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凡将篇》远矣。”

元代和明代在农村里设社学，儿童入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明吕新吾在《社学要略》中说：儿童“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这里说明了学习这三种教材的主要目的。

清代儿童识字用的基本书也是以上三种，还有《杂字》书等。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以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可见清代的教育家也是很重视儿童的识字教学的。

封建社会的儿童教育，从不放松它的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要求。从童年开始就注意培养儿童符合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的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儿童教材也是与这一要求结合着的。

古代儿童学完第一阶段的字书以后，一般接着学习两种儒家经典：一种是《孝经》，一种是《论语》。从汉至清，几乎都是这样。《汉书·平帝纪》说：“庠序置《孝经》师一人。”史称顺帝“始入小学，诵《孝经》章句”；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王充八岁从书馆出来，从师受《论语》、《尚书》。南北朝时，岑之敬五岁读《孝经》，马枢六岁能诵《孝经》、《论语》。唐代设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儿童能通一经和《孝经》、《论语》的，给予官职或出身。元程端礼订的《读书分年日程》中规定八岁入学之后，先读《小学》正文，次读《论语》、《孝经》等。直到清朝末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初等小学一年级须读《孝经》、《论语》，“每日四十字，兼讲其浅近之义”。由此可见，这两种书作为儿童教材的时间是很长的，目的是灌输儒家的思想和道德观念。

宋朝以后，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的理学为历朝统治者所推崇，按照这种思想体系来编写的儿童用的伦理教材，逐渐增多起来。朱熹编的《小学》是一本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儿童教材。他自己说编这本书是想“授之童蒙，资其讲习”，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以达到“有补于风化”的目的。该书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明伦一篇又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为目。朱熹有一种理论，认为小学的特点是以事教，所谓“学其事”，因此在《小学》中提出了许多格言和故事，作为“做人的样子”；大学是以理教，所谓